

四川阆中村民的发现改写了当地历史

赵舒文 本报驻四川记者 付远书



灵山遗址发掘现场,张义民(近前躬身着衫者)协助考古队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李俊亮 摄

2016年6月,四川省阆中市梁山村村民在古城东北方向的灵山开荒修建蓄水池时,挖出大量有神秘纹饰的碎陶、瓷片,后经有关方面考古发掘,日前,记者从四川省阆中市灵山遗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及其成果发布会上获悉,阆中灵山遗址考古取得重大发现,考古专家推断灵山遗址的年代最早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发现将阆中乃至南充有据可考的人类活动历史,从距今约3000年提早到了4500年至5000年,这也是首次在嘉陵江干流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意外发现 村民张义民的义举

灵山地处嘉陵江与东河交汇处,距阆中城区约5公里。遗址位于灵山山顶与山腰台地上,其发现纯属偶然。

2016年6月的一天,阆中市文成镇梁山村村民张义民在灵山山腰一块荒地上挖蓄水池,挖到1米多深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碎陶片。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奇怪,没有太在意。但继续往下挖,陶、瓷碎片越来越多,张义民立即停工。几天后,恰逢阆中市天文考古队到梁山村做田野调查,张义民便拿着几块挖出来的碎陶片给考古队成员查看,请教他们。考古队成

员们也详细询问了张义民相关情况,随即打电话向阆中市文管局工作人员刘富立汇报情况。当天下午5点,刘富立赶到灵山查看现场,并对村民们挖出的陶、瓷碎片进行采集并拓片,随即将相关情况上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队队长孙智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说:“我们在查看现场时发现原有原生地层和疑似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和石器,认为还是比较重要的发现,应该进行抢救性发掘。”随后,孙智彬与阆中市文物局同志分别向单位和地方领导部门汇报,申请发掘许可。

考古工作于2016年9月19日正式开始。经过9天的考古调查及勘探工作,2016年9月2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充市文管所、阆中市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式对灵山遗址进行田野发掘。

时代跨度大 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经过4个月紧张的考古发掘工作,灵山遗址的全貌终于呈现在世人眼前:遗址呈南北分布,南北100米、东西60米,分布面积约6000平方米,保存状况较好。

据了解,灵山遗址考古发掘面积360平方米,其文化层厚度达80厘米

至290厘米,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可划分为6层至13层;考古工作人员从中发现灰坑、房址、墙、灶、柱洞、燎祭等遗迹38个,还有大量的石器、陶器、铁器等遗物。

“从文化层和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以及出土遗物观察,灵山遗址的时代可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唐宋、明清及近现代几个阶段,其中以新石器时代遗存最为丰富。”孙智彬介绍。经考古工作人员分类,灵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灰坑、柱洞、灶、燎祭等遗迹,以及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灵山遗址唐宋时期的遗存包括房址、灰坑等遗迹,釉陶、砖瓦残片、瓷片、石构件、“开元通宝”铜钱等遗物。遗址明清的遗存有房址、墙、灶等遗迹,以及砖瓦残片、建筑构件残片、青花瓷片、石构件、残石雕、残铁片等遗物。

“这是我们在嘉陵江干流中游首次发现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孙智彬透露,四川盆地考古工作开展多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有很多,这些遗址大都分布于成都平原、长江流域重庆段、金沙江下游等。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嘉陵江一带,在这方面一直没有突破。“灵山遗址所在的阆中市文成镇梁山村,恰好地处嘉陵江与东河交汇处,它的发现,填补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空白。”



灵山遗址出土的器物盘 张晓东 摄



灵山遗址出土的石矛 张晓东 摄

发现燎祭遗迹 遗址或为古代祭祀场所

专家指出,如果不是当地村民的偶然发现,谁能想到这块灵山荒地地下竟藏着4500年至5000年前的历史遗存。几百年前,先民在这里生产生活的轨迹如何,值得探究。

在此次灵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灵山山顶发现了红烧土遗迹。考古人员认为,不排除是古代燎祭遗迹。这也是考古队首次在四川发现的位于山顶的燎祭遗迹。燎祭是我国最古老的祭祀方式之一,形式多为焚烧树枝、谷物等,也有火烧动物甚至人的。此次发现的祭祀点或为燎祭点。此次发现的祭祀点或为燎祭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冯时认为,灵山遗址出土遗物多为陶器和石礼器,很少出土生产工具,说明灵山的先民并不是以农业生产或手工业生产为主,磨制精细的三孔石刀或许显示了其与灵山作为祭祀场所的联系,而陶器器既有可能是祭祀者的生活器皿,也有可能是祭祀容器。

京东大鼓星火日系列活动津门举办

本报讯(记者胡克非)近日,由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宝坻区政府主办的全国京东大鼓星火日系列活动在天津宝坻区举办。活动包括纪念京东大鼓名家董湘昆诞辰仪式、京东大鼓传人收徒仪式、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天津(宝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传承人基地揭牌仪式、京津冀京大鼓新秀展示等,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重庆、黑龙江等地的京大鼓从业者与爱好者参加。

在京东大鼓传人收徒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通过特色鲜明的传统收徒模式进入京大鼓传承人门下。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天津(宝坻)非物质文化遗产

小传承人基地的成立,为少年儿童提供了广阔学习和展示平台,加强了非遗在少年儿童中的传承,为非遗保护与传承注入新活力。在京津冀京大鼓新秀展示中,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京大鼓新秀带来的《星火燎原》《星火燎原后继有人》等新近创作的鼓曲节目获好评。

天津市宝坻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亚秀表示,全国京大鼓星火日系列活动将有效运用非遗保护传承模式,打造独具宝坻特色的“星火梦 燎原情”,更好地传承弘扬京大鼓艺术,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展示宝坻在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公共文化发展中取得的新成果。

《中国香文献集成》发布

本报讯(记者王学思)6月15日,由中国民俗学会中国香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香文献集成》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办。

《中国香文献集成》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古代香学文献集成。该书在中国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亮主持下,力邀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李良松领衔,在同业书局同仁具体执行下,前后历时两年多,查阅了大量香文化书籍、论文和数百种古代文献,调动了数十家藏书

机构和藏书家的力量,最终征集到近300种香文献合编成册。全书共分古代香文献、本草方剂香文献、域外香文献、民国香文献4个部分,合计36册。

与会专家表示,该书的出版为香文化研究者、爱好者及香产业从业者提供了十分翔实的文献史料,有助于更好推动中国香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全面发展。专家建议在本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可在线查询、阅读的香文化数据库,从而让更多民众接触、学习与利用香文化和香文献。

武汉博物馆馆藏鼻烟壶亮相京城

本报讯(记者屈嵩)为集中展示鼻烟壶的艺术魅力和精巧工艺,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武汉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掌中珍玩——武汉博物馆馆藏鼻烟壶特展”日前在北大红楼开幕,将持续至8月9日。

展览由“斑斓彩色——玻璃鼻烟壶”“山岳精髓——玉石鼻烟壶”“陶瓷生花——瓷鼻烟壶”“珍奇斗艳——多材质鼻烟壶”4部分组成,共展出武汉博物馆馆藏鼻烟壶120件(套),多为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作品,品类丰富、造型多样,其中包括清末民初京派内画鼻烟壶四大名家——周乐元、马少宣、叶仲三和

闫玉田的多件内画鼻烟壶精品,极具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展览中最吸引眼球的是粉彩《西厢记》故事鼻烟壶,一组12件,每件尺寸相同,壶体均为方形扁,壶口偏于壶体一侧,其上施金彩并绘有花纹图案;壶体正反两面多施红绿彩,绘有《西厢记》人物故事图,壶底均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识。因为鼻烟壶绝大多数是单件,像这样流传下来的组套粉彩鼻烟壶极为少见,具有重要收藏价值。

此外,本次展览还集中展出了以铜、蜜蜡、琥珀、骨木、木类、贝等材质制作的烟壶,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安徽黟县文化遗产助力全域旅游

本报讯(记者刘修兵)“平时一间客房200元到300元,节假日或黄金周期间价格更高,还供不应求。”安徽黟县宏村村村民王利玲表示,她利用自家房屋经营民宿,一年收入10多万元。在黟县,文化遗产正成为当地开展全域旅游的重要支点。

据了解,安徽黟县境内有1684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古民居有1590处。西递村、宏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有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个全国历史文化名村、31个中国传统村落、1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黟县县域面积8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万,目前拥有旅游景区景点22处,其中国家5A景区2处、4A景区

4处。2016年,黟县接待游客144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9亿元。至2016年底,全县旅游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2万余人,景区周边群众70%收入来源于旅游业。

“为全面提升西递村、宏村等古村落业态品质,全力支持古建筑保护利用创新,黟县逐步扩大‘黟县民宿’等新型业态的市场影响力,近年来积极打造精品文化客栈服务体系。”黟县旅游委负责人表示,黟县通过开发民宿客栈、非遗展示、乡村民俗体验等特色产品,促进了古民居及非遗资源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同时,黟县挖掘茶文化、养生文化、丝绸文化等的丰富内涵,促进文化旅游叠加联动,开发了摄影、写生等一系列文化体验特色产品。

优秀传统文化,让精神家园更具魅力

——第四届中国非遗保护(德清)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王学思

日前,在浙江美丽的莫干山下,以“传统文化与精神家园”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德清)论坛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文化报社、浙江省文化厅、湖州市政府联合主办,120余位与会代表就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精神家园共建共享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传统文化 让精神家园内涵更丰厚

中华民族在5000年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忆。古城、古镇、古村,展示着完整明晰的历史文脉;经史子集,承载着深厚丰富的国学符号;民间挖掘不尽的传统工艺、表演艺术、风俗民情,表现出祖先超凡的智慧,寄托着天人感应的意象;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蕴含着太多建设现代文明应该遵循的准则。专家指出,传统文化使我们的精神家园具有超凡的气象和魅力。

浙江省文化厅非遗处调研员王淼说:“精神家园是什么?大致则有,具体则无,似乎总说不太清楚。但细

想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精神家园,它是人人向往的地方,里边是家国情怀,是正能量,是满满的幸福感。它是家乡和父母的牵挂,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传统村落,是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清明、端午等传统佳节,是看戏、听大书,是博大精深的经史子集……传统文化使我们获得了有别于他人的特殊品性,构成了我们自己的族群记忆,使我们成为我们,而不是别人。精神家园是我们心底最美的期望,它使人由浮躁走向踏实,由彷徨走向坚定。”

非遗传承 从个人行为到社会活动

精神家园是多元、丰富多彩的,同时它也并非一成不变,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从非遗保护传承的时代特点出发谈道:“本世纪之初,非遗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它不仅成为了热词,而且在人们的情感上也一下子产生了某种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传承人的体会尤为深切。如今,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使他们突然变成了‘左手拉着历史、右手牵着未来’

的人。如果说过去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个人行为的话,今天已经是一个群体性的社会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在绝大多数传承人身上体现了文化自觉,他们将自己的技艺知识、对民族文化历史的贡献看成是一种公共财产,‘不能把祖先留下的东西带到棺材中去’,他们这种自觉保护意识值得敬佩。”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坚表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气象,如拓展了非遗传承发展的新思路,拓宽了非遗普及传播的新手段,同时也丰富了人们了解和欣赏非遗的方式。

立足浙江,放眼全国

浙江是非遗大省,近年来,浙江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非遗保护传承发展方面的实践与经验,也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从在全省部署实施省级以上非遗项目的“八个一”保护措施,到强化对传承人的保护和激发其主观能动性的“服务传承人月”活动开展;从创设各类保护载体、探索分类保护方式的实践,到自主实施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项目、积极推动海外文化交流,浙江走出了一条扎实、稳健、科学且富有前瞻

性的保护之路。

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宋合意表示:“浙江富于文化遗产,浙江人民富于文化创造,浙江的领导干部富于文化情怀,浙江的文化工作者富于责任意识,浙江的传承人富于传承与创新精神……正因如此,浙江的非遗保护传承实践成果丰硕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强调:“要埋头做事,但也不能忘记抬头看路。非遗保护工作不仅需要法律的保障,政府的主导,还需要强有力的智力支撑。浙江方面能够联手中国文化报社共同举办四届论坛,看似务虚,实则求实。非遗实践的探索尤其不能摸着石头过河,需要理性的思考,要有敬畏历史、爱惜传统的谦卑态度。历数这四届论坛的举办既是立足浙江的实践,同时也是放眼全国,为当下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为了交流探讨和推动非遗保护工作,此前,浙江省文化厅曾会同中国文化报社围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文化命题,先后在杭州市余杭区、舟山市以“国家文化安全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美丽中国与美丽非遗”“文化强国与海洋文化”为主题举办中国非遗保护论坛。



近日,在河北石家庄元氏县东正村,村民们排练“抬花杠”。河北省省级非遗项目“抬花杠”是石家庄元氏县东正村的传统表演项目,起源于隋唐年间,原来是在春节、庙会时祭祀三皇姑仪式中仅仗队领队的舞种,后来除了祭祀仪式外,也成为当地村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民间团体舞蹈。“抬花杠”杠长约4米,中间的箱子重四五十斤,雕龙画凤,抬着花杠的两位舞者不能用手扶杠,仅用肩、颈、头、腰等部位控制,做出各种动作,同时最少四抬、多则几十抬花杠同场表演,团队配合默契度高,表演难度较大。

新华社发(蒲东峰 摄)